

古诗英译的叙述艺术

——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译诗比读

陈奇敏

(武汉纺织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从叙述时序、叙述视角和叙述结构三个方面,对陶渊明的诗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及其两首译作进行了叙述艺术的对比研究。原诗体现出汉语古诗的传统叙述特色,而两首译诗则以独特的翻译策略实现了中英叙述传统的有机融合,各有侧重地传达了原作的诗性美学光辉,促进了东西方跨文化交流。

关键词:叙述;诗歌;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414X(2013)05 - 0042 - 04

一、前言

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受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影响,叙述学(Narratology)理论逐渐代替传统小说理论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经典叙述学家以大量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种种叙述话语形态,使叙述学经由法国为轴心辐射至世界各地,成为文艺理论界的新兴研究热点。而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本土化的叙述研究也有了显著成果。研究者们借鉴西方叙述理论,展开了对中国古典文学以及现当代小说、影视、戏剧、新闻报道等多种叙述作品的深入研究,唯独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尚未成为叙述学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例如中国期刊网数据库显示,从1980年至2012年,以“叙事学”或“叙述学”为主题的核心期刊论文有1272篇,而其中以诗歌为讨论对象的文章仅有25篇,数量微乎其微。然而诗歌的美感传递与叙述方式其实有着密不可分的深层联系,正如米克·巴尔所言,“任何叙述作品,都可以用叙述学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与过去的分析绝不雷同的结论”^[1]。因而从叙述学理论视角审视诗歌必将带来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

叙述学研究分为经典与后经典两个派别。经典叙述学旨在建构叙述语法或诗学,后经典叙述学则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叙述作品之意义的探讨,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2]本文将结合经典与后经典叙述学的研究方法,从叙述时序、叙述视角和叙述结构的角度比读陶渊明的诗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原文及其两种译文的叙述艺术,以探索文本内外的语境因素与文本语言形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并对古诗英译的实践和批评提供些许观照。

二、陶诗特色及翻译概况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以诗的成就最为突出,多以田园生活为题材,以日常事物为形象,描写农村景物、反映村居生活。现存诗歌一百二十多首,风格恬淡质朴,其中《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以下简称《怨诗》)是陶渊明晚年隐居生活困顿状况的真实写照。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家乡混战连年,加之自然灾害,农田收成无望,百姓流离失所、衣食无着,陶渊明通过个人经历的书写,展现了痛苦无望的民生状况和凄凉败落的历史画面。此诗五言一句,共有20句,继承了乐府民歌的古朴诗风,而对穷困生活的平白描摹越发反衬出诗人高远脱俗的志趣。全诗如下: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黾勉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

炎火屡焚如,螟蛾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

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3]

《怨诗》在陶渊明田园诗中的影响力虽不及《归园田居》和《饮酒》等诗,但对体现诗人丰富的创作主题和传达诗人的人格情操等意义上也不容忽视。据《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所录,该诗的英译至少有五种版

作者简介:陈奇敏(1975-),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3g272)。

本。在此，笔者拟对原诗和汪榕培先生、方重先生的两首译诗的叙述艺术进行比读。汪榕培先生和方重先生都有丰富的译诗经验和深厚的语言功底，但二人在叙述方式上却又各具特色，营造了不拘一格的诗歌意境。汪译的特点在于韵律和谐、建行整齐、理解精确、表达地道，比较成功地表现了汉语古诗的“音、形、意”之美。而方译则不受原诗形式和格律的羁绊，重在神似，突出了陶渊明诗歌中质朴恬淡的散文化笔调。

三、叙述时序对比分析

叙述的时间顺序即事件或时间段在叙述话语中的排列顺序。追叙和预叙为两种基本叙述时序，但在具体的文本中，叙述时序存在不同的变异形态，表现出各种独特的审美功能。

从原诗的叙述时序来看，诗人立身当前、向两位友人讲述过去，最后又走出回忆，回到当前，发出感慨，总体时序属于概括性倒叙。而在回顾一生的坎坷经历时，诗人一开始似乎在按照故事的发生时间顺序进行连贯叙述，如三至六句简要总结了前半生的故事（“结发念善事，黽勉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其中的“结发、弱冠”等词都是具体年龄的代名词。但确切来说，诗人其实比较淡化叙述时间观念，其讲述是以重要事件的发生为线索而连贯起来的，例如从第七句至第十四句每句都讲述了一种灾难或痛苦，而没有具体的年份交待（“炎火屡焚如，螟蛾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

以重要事件为叙述线索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叙述方式。翻译《史记》的汉学家浦安迪认为，西方传统的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观点是“一篇叙述文必须要遵循某种可辨识的时间性‘外形’或‘模式’，才会使全篇叙述文产生首尾一贯的印象”；而中国的历史叙述文一方面“把人生的经验流截成一个个小段，另一方面又把一段段单元性的人生经验组合连贯起来，营造成经验流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史事’是截断的标准。也就是说，中国的史文藉‘事’来划定整篇叙述文从哪一点开始，经过怎样几个阶段，到哪里终止。”^[4]《怨诗》虽然不是历史叙述文，以上论断却完全符合其叙述特点，这也表现在中文诗歌语法却没有时态变化而英文翻译中却有“现在”、“过去”、“将来”的时态变化上。

汪译对叙述时序的处理手段与原诗叙述方式似是而非。乍一看，译诗与原诗句句对应、大意吻合，其实译诗改变了原诗以重要事件为叙述线索的手法，加强了时间在叙述中的引导作用。例如，对于三至六行诗句的翻译，译者并不理会年龄代名词的描绘性特征，将年龄一律用具体数字来表示，并且放于句首，形成四个排比句，

突出了时间的顺序作用。

At fifteen I began to do good deeds; /At fifty-four I still stick to my creeds.

At twenty in hard times I lived my life; /At thirty years of age I lost my wife.^[3]

而对于七至十四句没有具体年份交待的事件，译者根据英语语言重“形合”的特点，增加了“while, when, then,”等时间连接词，并放于句首，按时时间发生的先后次序。

The scorching sun destroys the yearly yields /While locusts run rampant in the fields.

When wind and storm destroy the rice and wheat, /Then I can hardly keep their both ends meet.

Starved in summer I am in a plight /And I have no quilts for the winter night.

At dusk I idly wait for cocks to crow; /At dawn I hope that darkness will soon grow.^[3]

很明显，汪译使诗歌的叙述时间明朗清晰，读者仿佛看到诗人的坎坷一生对着时间画卷一一展开，这符合西方传统文论强调故事在时间过程中的演变的观点。

方译在叙述时序的处理上则与原诗亦步亦趋，大同小异。对于年龄代名词方先生基本上是直译其描述特征、而忽略具体数字，也没有使用过多的连词暗示先后顺序，且句中时间状语的位置十分随意灵活。

Since first I set my youthful heart on doing good; /For fifty odd years have been up and down the world.

But evil days broke upon me in my early manhood, /When my first wife died soon after our union.

Then the raging fire often burned down my house, /And mercilessly the insects infested my field.

Wind and rain come rushing from all directions, /My harvest could not fill up one square foot.

On long summer days I used to suffer hunger, /And uncovered, I slept through winter nights.

I would the cock start to crow at dusk, /And the dawning sun soon to sink into the west.^[3]

译文保留了中文特殊的时序表达手法，这种叙述方式虽非西方叙述传统主流，却具有印象派风格，使人的悲惨遭遇就像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一个个特写镜头并不连贯却会激起读者强烈的同情心。在文学形式不断革新和中西文化交流日盛的今天，这种译法适当地突出了源语的文学特征，促进了东西方思维模式的碰撞和交流，自有其可取之处。

四、叙述视角对比分析

叙述视角是指事件叙述者的感知角度,涉及对事物的特定看法、立场观点或感情态度。同一事件在不同的叙述视角观照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性质。^[5]因此,关注叙述视角的文本意义内涵及其形成缘由,就有可能超越文本的表面意义,深入追溯文本的主题和诗性感染力。

在叙述视角上,原诗诗行的主语大多时候被省略掉了,但从题目、内容的暗示以及最后发出感慨性的评论时出现了叙述者身份的明确描述(“在己何怨天”、“于我若浮烟”),读者能够判断诗歌采用了第一人称有限视角来讲述,向二位好友以及读者倾吐一生的坎坷经历。相对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而言,用第一人称单数作为叙述视点,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强化了叙述的真实感,叙述显得更加逼真动情。同时,第一人称主语的省略不仅体现出汉语古诗语法结构的精炼,而且扩大增强了诗歌的美学感染力,正如叶维廉先生所言,“超脱了人称代名词,便使词情诗境普及化,既可由诗人参与,又可由你由我参与,由于没有主位的限指,便提供了一个境或情,任读者移入直接参与感受”^[6]。具体到这首诗而言,读者可能不仅会为陶渊明的凄凉悲怆而痛心,也会联想到所有与之同时代或异时代的农民的相似遭遇而倍感同情,这正是文学作品在典型情境中揭示典型意义的美学价值。

在两首译诗中,二位译者都准确地判断出原诗的叙述视点,并在译诗中照直采用第一人称单数有限视角。所不同的是,原诗中的第一人称只在全诗末尾出现过两次,而在直接叙述自己悲惨遭遇的过程中省略了人称;两首译诗却在诗人追忆往事时不约而同地添加了“I, my, myself, our”等第一人称代词。在汪译中第一人称代词出现了十四次,而在方译中第一人称代词出现了十三次。叙述者的添加是汉语古诗英译的常见转换手法,重分析、重形合的英语语言对句子中语法成分的严格要求使译者不得不采取一定形式的变通,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原作诗学经验的扩散和读者的想象力,却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符合英语读者的审美和思维习惯,避免了语言形式过度异化带来的解读障碍和失误。

五、叙述结构对比分析

叙述结构可以被视为一种文本形成的框架结构,叙述的风格在此结构基础上形成并展现于读者眼前。

从叙述结构来看,原诗符合汉语叙述传统中的“二分”结构。傅修延认为,汉语从字形到音韵到词汇、句子直至篇章构成莫不以“二分”为基础。^[7]毛荣贵则提出“汉语受阴阳逻辑的制约,即话题与说明的结合、背景与活动的结合、正说与反说的结合、辩证思维的结合。汉语的样态是‘二分’,即逻辑上的阴与阳两个部分,在句子的构成上,常常分为话题和说明两个部分。”^[8]汉语古诗虽然不

分段落,但一向注重“咏物言志”的内在二分结构。此诗亦由描写和议论两大块构成,从首句至第十四句概括描写了诗人的生平际遇,提出了一个话题,最后六句抒情感慨,发表议论,表达了诗人贫困不移、超然物外、不求俗名的高洁情操。

汪榕培的译诗基本上未改变原诗的形式与结构,每一行译诗都与原诗意义相对,忠实传译了汉语古诗的建行形式与结构特征,可以让更多的英语读者了解到原诗的外形及叙述风格。而方重译诗则大幅改变了原诗的外在形式,将完整无间的外在形式分割成三个部分。译诗前四句为第一段,概括引出诗人将要叙述的话题;第五句至第十四句为第二部分,是篇首话题的详细描述、扩充部分;而原诗中最后六句被译者译为八句,是总结部分。译者这样做用心良苦,因为这种叙述结构十分符合英语的“三分”样态,“英语段落讲究主题句、扩展句和结尾句,英语文章多有引言、中间和结尾”^[8]。方译因而更符合以英语诗歌的叙述体例,照顾了英语读者的审美期待,其目的是使陶渊明的诗歌更加自然地走进英语读者心中,并受到他们的喜爱。

六、结语

伽达默尔认为翻译“是一种突出重点的活动”,任何翻译都不可能是所有意义因素的完全再现,除了时间空间差异会对原文造成理解的模糊性,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也决定了完全再现的不可能。^[9]从以上对陶渊明《怨诗》英译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出,汉语原诗与英文译诗在叙述视角、叙述时序及叙述结构上不尽相同,这既源于英汉语言自身的差异和叙述传统中西的差异,也与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理念息息相关。作为资深的诗歌译者,汪榕培先生和方重先生在翻译中用不同的叙述手法融合了中西诗歌叙述艺术的差异,各有侧重地表现了原作的诗性美学光辉,推动了中西跨文化交流的进程。

通过比读该诗的译文,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迪:在古诗英译中,译者既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移植原诗的叙述艺术手法,也不应该采取全盘归化的叙述策略,因为这两种做法都有悖于跨文化交际的原则和目的。译者应考虑到两种语言的固有差异与叙述传统,结合当前的国际交流背景与自己的翻译目的,选择合适的翻译叙述策略。而翻译批评也不应局限于单一的译作评价体系 and 标准,译者的不同选择及其深层文化根源应得到更多关注。

参考文献:

- [1] 米克·巴尔. 叙述学:叙述理论导论[M]. 谭军强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3.
- [2] 申丹. 叙事学[A]. 赵一凡, 西方文论关键词[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726-735.

- [3] 汪榕培. 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230-235.
- [4] 浦安迪. 中国叙述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57-59.
- [5] 马珏珺. 宋元话本叙事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J]. 文学评论, 2001, (2): 97-106.
- [6] 叶维廉. 语法与表现: 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美学的汇通[A]. 海岸选编, 中国诗歌翻译百年论集[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442.
- [7] 傅修延. “二合”——汉语叙述的优雅传统[A]. 乔国强, 叙述学研究[C].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6. 1-14.
- [8] 毛荣贵. 新世纪大学汉英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2. 193-194.
- [9] 伽达默尔. 整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 洪汉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499.

Narrative Techniques in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to English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s of Tao Yuanming's Poem "A Complaint"

CHEN Qi-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ronological order, narrative viewpoint and textual structure,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original and two translations of the poem "A Complaint" by Tao Yuanm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original poem embodies typical narrative features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while the two English versions are the flexibl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narrative traditions, conveying the poetic beauty of the original with their respective translation techniques, and promoting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in an effective way.

Key words: Narration; Poetry; Translation

